

• 中国现代革命史资料丛刊 •

西安事变资料

(第二辑)

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

人民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发行

六〇三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32开本 10印张 204,000字
1981年4月第1版 1981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
印数00,001—18,200

书号11001·424 定价0.87元

(内部发行)

出版说明

为了有助于我国现代史的研究，我们出版一套中国现代革命史资料丛刊。丛刊按专题选编，陆续出版。《西安事变资料》是这套丛刊的一种。

《西安事变资料》第一辑选收关于西安事变的历史文献资料一百余件。本辑选收西安事变回忆录十四篇。这些回忆录是作者根据亲身经历及当时的见闻写成，具有历史参考价值。文内某些问题的观点，或个别事实、情节的叙述，可能不够准确或互不一致，编者一般均保持原貌，有待了解事变情况的同志及史学工作者研究核实。以后各辑将陆续选收西安事变回忆录及有关资料。

本辑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姜克夫、黄德昭、王秦选编。

中共西北特别支部与西北抗日救

- 国会……………徐彬如(1)
西安事变杂谈……………高崇民遗稿(11)
西安事变与张学良将军……………秉又文(66)
从上海到西安……………孙达生(104)
从新生事件到西安事变……………胡愈之(127)

——深切怀念杜重远、高崇民同志

关于党争取东北军联合抗日的

- 回忆……………刘培植(145)
西安事变前后张学良将军的政治
思想变化……………解方(153)
华清池捉蒋回忆……………张化东(176)
西安事变前的东北军学兵队……………康博纓(183)
西安学兵队生活片断……………冷拙(193)
周恩来同志与东北救亡总会……………于毅夫(203)
回忆蒋自明与莲湖食堂……………童陆生(238)
杜重远烈士事略……………于毅夫 关梦觉(247)
忆张学良将军……………何柱国(260)

中共西北特别支部与 西北抗日救国会

徐彬如

一、关于中共西北特别支部和“西救”的活动

我当时负责西北各界抗日救国会(简称“西救”)工作。“西救”与在上海的全国各界抗日救国联合总会(简称“全救”)有联系,但没有组织上的关系,上海总会有党组,那是保密的。上海总会的前身是“九一八”以后成立的中国人民武装自卫委员会,由马相伯等人组织的,后发展成为全国各界抗日救国联合总会。“西救”在党的关系上归中共中央军委留沪办事处领导,办事处直接由陈赓同志主管(当时陈赓同志已不在上海了)。

我们主要抓西北军,通过军队中的党员进行工作。一九三五年“八一”宣言后,我们派人到杨虎城部队,利用杨的关系,开展西北地区救亡运动。我们通过杨虎城的宪兵营营长金闵生(大革命时金是叶挺部下,抗日战争时去世)和杨虎城的参谋处长王根僧(解放后任过新疆军区参谋长,已去世)开展救亡活动。一九三五年九月,杨虎城欢迎我们派人去,杨虎城派总参议杜斌丞负责联系和管理这方面的工作。由于杨的支持,抗日救亡工作很快就开展起来了。首先从文教界的上

层开始,如西安师范、高中和二中的校长、教员等最早组织起来,成立西北教职员抗日救国会,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活动,散发“全救”宣言和传单。西安群众初步发动的情况反映到上海地下党后,军委留沪办事处就派谢华(即谢兹山,现任湖南省政协副主席),来西安领导抗日救亡活动,并于一九三五年十二月组织中共西北特别支部。西北特别支部主要成员有谢华、徐彬如、李木庵、宋绮云(《西北文化日报》社长)等,它和军委留沪办事处发生关系。不久,上海通知说: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,我们联系上了,已把你们的关系转到苏区,西北特别支部以后归苏区管。在未找到苏区的关系前,我们继续管;找到苏区的关系后,特别支部就不再与上海发生关系。“西救”公开同“全救”发生联系,以作为全国总会的一部分,也可以独立进行活动。

一九三六年二、三月间,中共西北特别支部找到了苏区的关系。通过陕北苏区派来的交通,我们写报告给中央,周恩来同志向毛主席反映西北社会情况和杨虎城、张学良的情况(我们不写张学良的情况,那是另外一个系统管的,我们互不发生关系;张的情况,我们是从旁了解的)。我们的书面报告引起毛主席的重视,毛主席正在找人做杨虎城和西北军的工作。毛主席很快就派他的秘书长张文彬来西安负责西北军中党的工作,从此,西北特别支部的领导关系也解决了。

张文彬来西安后,四、五月间就通过西北军建立了一个秘密联络站,运送物资、枪支,输送干部(丁玲、冯雪峰就是通过这个联络站进入苏区的),与上海、天津等地建立了交通网。一九三六年三、四月间,东北军系统也建立了联络站(这条线不

输送干部)。陕北苏区陆续派人来西安作了很多工作。五、六月间,学生救国会,妇女救国会,青年救国会等相继成立,统归“西救”管。西安事变前,“西救”下属有二十三个组织。“西救”不设主席或主任委员等职务,只设立几个组:总务组负责对外工作,有杨明轩、李木庵、韩卓儒等人;谢华管组织组(不发展党员);我管宣传组;捉蒋后设武装部,宋黎负责。

“一二九”运动后,北平成立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(简称“民先队”)。一九三六年七、八月间,民先队大部分人员(东北大学学生较多)到西安依靠东北军的力量。他们公开找“西救”联系,要求在西北地区组织民先队。我们让学生头头西安高中学生李连璧组织民先队,有三十五、六人参加,归“西救”管。

东北旅陕人士高崇民(原沈阳商会会长)、车向忱等随东北军来西安办学(先后办竞存小学、竞存中学),在这时组织“东北民众救亡会”(简称“东救”)。七、八月间,“西救”和“东救”把西安地区的救亡活动汇合起来,几次大的群众运动,如去省政府请愿,声援绥远抗战,要求南京政府抗战,都统一起来了,东北学生和东北军家属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,声势相当浩大。

面对日益高涨的抗日救亡运动,蒋介石也派人到西安活动。他派到西安的驻陕第六宪兵团团长杨镇亚、国民党省党部郭紫俊、西安市公安局局长马志超以及地方上的保安处处长张海如等,都是拥护蒋的镇压群众运动的企图的。张、杨对群众运动有意加以保护。张学良组织学兵队(孙铭久是队长),便衣保卫学生、群众。这个东城门楼上的学兵队为我党培养了很多干部。人数由一连发展到一营,双十二时已发展为特

务团。杨虎城的宪兵营有许多共产党员是归我们“西救”管的，也派便衣保护“西救”活动。蒋介石在陕西只有一个宪兵团，保卫省政府的仅一连人，因此不敢公开镇压。

十月十九日，“西救”、“东救”发起在民众教育馆召开追悼鲁迅大会。这是一次很大的斗争，国民党宪兵企图制止。我们斗争比较策略，上层工作做得很好。民先队找来几个老头子主持大会，张学良、杨虎城都送来挽联，在这种情况下，国民党省政府主席邵力子也送来挽联：“大名堪比高尔基，大作犹称孔乙己”，台上坐着一些老头子，下面坐着学生、群众，张文彬和我都参加了。大会开得很热烈，蒋介石的宪兵们被弄得莫名其妙，就主动撤了。隔几天后，东北方面也在民乐园开鲁迅追悼会，被国民党宪兵镇压了。

最高潮是“一二九”运动一周年纪念活动，“西救”、“东救”及学联发动群众游行请愿，要求蒋介石停止“剿共”，一致抗日，援绥救国，动员了将近一万多人参加。蒋介石住在临潼，他下令如果游行队伍到临潼就开枪，格杀勿论。西安的城防由杨虎城的部队管（参谋处长王根僧负责），张学良是驻军。这次游行请愿的总指挥是张文彬，指挥部设在金家巷王根僧家中。“西救”、“东救”等二十九个组织有领导、有组织地行进。上午在城内请愿后要到临潼去，邵力子要杨虎城关闭城门。丁志民带领学生群众到这个城门又折到那个城门，都出不去，宋一平、何贵生、李连璧、李瘦枝、熊值貌等都是各路指挥。学生们听说如果到临潼蒋介石就要开枪，更加气愤，一定要去。我们还鼓动盲人、士兵参加。下午四、五点钟，商家、居民送来了大批馒头，支持请愿游行。特别支部计划在六时开城门（参谋

处长王根僧主管城门),到时候,游行队伍果然冲出城门。张学良一路随队伍进行劝阻,杨虎城在新城随时听汇报。在灞桥,张学良向群众保证在三天内用事实答复大家的要求。到晚上七点多钟,群众才有纪律有秩序地离开灞桥回城。在国民党统治下的西安,这次游行请愿指挥严密,热烈而悲壮,对张学良、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有直接的影响。

二、西安事变发生后的一些情况

十二日凌晨枪打响后,“西救”负责接管国民党陕西省党部。我们对要抓的人、关的人,调查得很清楚。我们随杨虎城部队抓杨镇亚,把杨的一家都活埋了,赶到马志超家,马已逃跑了。

周恩来同志十六日到西安,张文彬到飞机场迎接。他留着大胡子,先到西京招待所同我们地下党的四、五个负责人见了面。早在一九二八年周恩来同志在天津组织顺直省委时,我见过他,当时他留八字胡。那时他同刘少奇、陈潭秋等同志组织顺直省委工作。八年后他还记得我,他说见了西北特别支部的报告,就想徐彬如可能就是原来的徐文雅,果然是你。他离开西京招待所到金家巷剪了胡子才去见张学良的。

十二月二十日民乐园大会,民众和军队数万人参加,原来打算公审蒋介石,周恩来同志来西安后,才把大会内容改为反对亲日派示威大会。叶剑英同志穿东北军服装,张文彬穿西北军服装,我们都在主席台上(宋绮云任司仪)。张学良、杨虎城在会上讲了话。

周恩来同志来西安后的第三天就提出放蒋问题。他指示

我用“西救”发言人的名义在电台上讲可以放蒋，条件是要求阎锡山来调停。二十日大会又提出放蒋问题，会后有些外国记者骑马来到“西救”（原省党部旧址）采访。“西救”开记者招待会，明确提出放蒋。

十八日，周恩来同志还没有说服张、杨放蒋，他说要与群众团体负责人见见面。我和杨明轩、宋绮云、韩琢如（长安县长）作了安排，就在长安县县长办公室开的会。我们党的保卫工作人员还没有从陕北来，我带杨虎城部队的便衣人员（带枪），东北军的便衣也带枪赶来，双方差一点打起来，我们讲明了才知道是误会。张文彬也去了。杨明轩主持会议，每个救国会来一两个头头，有李连璧、何寓础、熊伯韬、武伯伦等共四十多人。周恩来同志从红军长征讲到国内外形势和我党对西安事变的方针，然后解答他们提出的问题。最后，周恩来同志试探性地提出放蒋的意见（他与张、杨谈放蒋也是试探性的），大家开始并没有重视，但杨明轩听说要放蒋首先反对（宋振镛说：我父亲也反对），几乎谈崩了。第二天（十九日）张学良理解了，他答应放蒋说：“我一切听周先生的了，周先生说放，我就放。”杨虎城对此不表态。

蒋介石开头顽固拒绝张、杨提出的八项条件的主张，后来答应了，说以人格担保“言必信，行必果”，但不肯签字。周恩来同志是每天向毛主席请示汇报的，毛主席同意可以不签字，说要他签字干什么，一回事嘛，他要推翻的话，签了字也没用。

关于周恩来同志见蒋介石的事，我是听张文彬讲的。张学良带周恩来同志去见蒋介石，张学良说周恩来先生来了，蒋介石一听脸色变了，非常害怕，连说：不见，不见。张学良笑了，

说周先生已经来了，你们是老交情，我们是近年新交。宋子文、宋美龄亦在场。周恩来同志进去了，同蒋介石握了手说，我的头是从你的刀底下滚过来的，现在都不说了，一致抗日吧！蒋介石很狼狈地说，我后悔了，杀人太多了。这时，宋美龄圆场说：算了吧，以后不剿共了。蒋介石当时难过得哭了（毛主席后来说此人没良心是指这一点说的）。

随后我们又动员杨虎城去见蒋介石，杨不愿意，蒋介石也不愿见杨虎城，两人互相恨得厉害。蒋介石说过，我没斗过杨虎城这个土匪，到西安上了他的当。

张学良说十二月二十八日送蒋介石回南京，蒋介石要求二十五日圣诞节回去赎赎罪。周恩来同志不敢作主，张学良不同意。毛主席说：二十五日和二十八日差三天，放他走算了。当时决定米春霖送行，下午四时飞洛阳。但是下午二时，张学良就陪蒋介石到了飞机场。蒋介石对张学良说：我们兄弟二人大仁大义，绝不抱怨，将来历史上记一笔，留芳百世。张学良很激动，要亲自送蒋介石回南京。蒋说，我们兄弟二人谅解，你到南京就不好办，他们打你的主意，我就遗臭万年了。蒋力劝张学良不要送他，宋子文犹豫不定，蒋介石还批评了宋子文。张学良动了感情，越发坚持要亲自送蒋介石。

十二月二十六日，在“西救”会办公的一百多人都不上班了。大家把西安事变捉蒋介石归结为四个字：英雄、冒险。

周恩来、张文彬到杜斌丞家找杜做工作，我同博古到杨明轩家做工作。杨明轩脾气大，对我们说：“你们来干什么？我要到华山当和尚去了。你们骗了我。”博古把话题扯到上海大学附中情况，当时杨明轩是博古的老师，从一大早谈到十一点，

杨明轩才消了气，答应第二天去“西救”会上班。杜斌丞还是想不通。

周恩来同志在西安几个月没有睡什么觉，他把全副精力都用在工作上。有一次在西京招待所开党内会议，他要我们不说话，让他睡三十分钟，到时间必须叫醒他，说完就睡着了，他实在太困乏了。他每顿只啃陕西的大锅盔喝开水，没时间好好吃顿饭。他珍惜每一分钟。如果没有周恩来同志的努力，西安事变要和平解决是不可能的，那非打起来不可。当时有多少人对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转不过弯来呀！

三、有关人员情况

中共代表团团长博古，副团长周恩来。红军代表团团长叶剑英，副团长罗瑞卿。

杨虎城委任张文彬为少校秘书，江隆基也是少校秘书。

一九三六年春，王炳南从德国回国，在上海做统战工作，同宋庆龄等人联系。他在上海与全救总会沈钧儒接过头，我们则与李公朴接过头。十月，王炳南来西安帮杨虎城办军官训练团。杨虎城任团长，赵寿山为副团长，王炳南负责制订训练计划、找教员等事项。

西安事变前，邓发跟叶剑英来西安是秘密的。双十二后，邓发就不再任保卫部部长，换为杜立群，后为许建国（解放后任过驻阿尔巴尼亚大使），一九三七年换为吴德峰。

四、关于《解放日报》等

十二日晨，我们就把《西京日报》社社长丁复进（兼中央社

西安分社社长)关起来了，由东北军接管《西京日报》改办《解放日报》。张学良推荐张兆麟任社长(张当时为“东救”会宣传部副部长，后去新疆，现为吉林大学教授)，李一氓叫我派韩进、魏文伯去任编辑。韩、魏都是北平来的，党的关系在李一氓处。《解放日报》是西北联军的机关报。

《西北文化日报》是西北军机关报，社长宋绮云，编辑王少峰(即陈翰伯)，也叫蒋孝风。

《西京民报》是东北军机关报，陈克寒是编辑。

《工商日报》是商界的，社长是张博初，编辑是吴焕然、张廷友等，主要工作人员都是中共党员。

西安事变后，李一氓叫我一道写“一二·一二意义”，在报上发表，周恩来同志来西安后指示我作修改，铅印出版。

五、关于中共陕西省委

西安事变后，党中央决定撤销中共西北特别支部，成立陕西省委。十二月二十五日上午十一时，博古从延安飞西安，即在谢华家开会(鼓楼北大街)，博古代表中央政治局宣布中央关于省委成员和分工的决定，高级将领的关系交中共代表团，一般民众团体工作归省委。参加这次会议的有罗瑞卿、贾拓夫、李一氓、宋黎、徐彬如、谢华、宋绮云、张文彬(欧阳钦可能后到西安，当时未参加)。省委书记贾拓夫，宣传部长李一氓，组织部长欧阳钦。西安市委书记张德生。我和谢华搞统战工作。省委在我家开过几次会，后到三原云阳镇开会。汪锋没有参加，西安事变后他到渭南阎揆要团(汪自己说当政委)，后调到云阳镇参加军委工作了。

一九三七年四、五月，博古到南京与蒋介石谈判，争取陕西省委合法。蒋介石说只承认中共中央不承认省委。周恩来同志对蒋介石说，你是从西安放出来的，你要承认，西安与陕北关系密切，有问题好联系。蒋介石被迫承认陕西省委。博古说徐彬如是省委代表。蒋介石指定天水行营政治部管陕西省委的问题。博古把我带到天水行营主任程潜处，见了政治部主任任觉吾（任白戈的弟弟），国民党省党部书记郭紫俊。博古向他们介绍说徐彬如是中共陕西省委代表。我家胥子庙街十五号即省委机关。当时贾拓夫与王明关系好，主张省委全部公开，我主张半公开。后来在我家挂《西北周刊》社的牌子，我是省委机关报《西北周刊》发行人。西安有一个同情分子免费给我们刻了一个“中共陕西省委员会”的石头图章（他给程潜刻图章，二百元一个字），省委图章在我家放了一年左右，后来交给欧阳钦，据说被周子健给丢了。

六、关于红军联络处

一九三七年四、五月间，红军联络处由三原搬到西安七贤庄，当时李涛在联络处工作。开始时博古为红军总代表（后为八路军总代表），博古走后才是林伯渠。

我们党在西安有三个系统：陕西省委，社会部和红军联络处。我虽在省委，也参加情报工作。

一九七九年一月

西安事变杂谈

高崇民遗稿

前 言

西安事变迄今已届三十年，当时的情况，大体是可以回忆起来，但事情的先后和其错综复杂，很难一一序列，故名之为杂谈。

西安事变的大体情况，虽尚能记忆，但某月日的时间，有的已记不太清。本篇所谈，凡不能记出时间的，只好铺陈其事，甚或有时时间颠倒亦所难免。

本篇所谈，是着重在事变过程当中的一些事情，其事变前之背景，与事变的结局，只择要一谈，不作为重点。同时，关于红军和十七路军两方面与西安事变有关的具体情况，我知道的很少，因而本着不知为不知的精神，谈的也很少。

关于群众爱国团体，如西北各界抗日救国会和东北群众抗日救亡总会陕西分会等组织，它们的活动，对于西安双十二事变亦有很大的推动力，但其实况，应有待于当时负责人的叙述，我除对于请愿援绥一事而外，都谈不出来。

在谈具体情况时，或多或少，有些夹叙夹议之处，只是表达本人当时的甚至到现在的观点和立论，见仁见智，当然有所不同，但并不自以为是，欢迎指正。

本篇所谈都是就本人当时亲自参加的，或出于别人参加说给本人事后知道的，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，不作夸张语，亦不为贤者讳，因此可能引起有立场不同的意见，亦所不辞。

所谓原始材料，除凭本人记忆而外，只有翻旧报，查档案，而旧报和档案亦有与实际情况相出入者，即皆当时亲身经历的人，今天亦言人人殊。本篇所谈是提要性质，并不全面，只能略供研究史料的参考，说不到都是原始材料。

西安事变中，各方文电甚多，但多属假象，不尽真实。无论一般性的不便抄录，即其重要的，亦只录其一、二，无必要完全抄录以占篇幅，况电文俱见于当时各报纸，随时可以翻阅。

本篇所谈，根据事情内容，有详有略，每节的文字亦有长有短。长者逾千言，短者或仅数百字，甚或数十语，不勉强求其平衡。

一九六六年八月一日

一、从九一八谈起

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，日本帝国主义用军事行动入侵中国。我东北辽宁、吉林、黑龙江三省，以及热河，先后沦亡。当时张学良将军任东北边防司令长官，同时又是国民党政府海陆空军副司令，（因此通常对张以副司令称之）因病在北平协和医院疗养。先是东北挂的旗帜，是辛亥革命以后，旧民国制定的红黄蓝白黑五色旗帜，表示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之意。于一九二八年，张学良因与蒋介石合作，改换青天白日旗，即国民党执政时的旗帜（蒋介石现在台湾仍挂此旗）。对这件事，一般简称为易帜。东北之易帜，是表示取消张作霖时期的军阀

割据，而服从国民党的所谓统一政府。因此，东北“九一八”事变发生时，张学良不能不向国民党政府有所请示。当时蒋介石命令张学良，不准东北军加以抵抗，将由他们的所谓中央，作为地方冲突事件处理。这样，便使日本军队长驱迈进，如入无人之境，不到一、两个月的时间，不费吹灰之力，囊括东三省的全部，掠为己有，使当时吾东北三千万父老同胞，遂陷于水深火热之中。东北沦陷以后，张学良将军无论如何，是失土有责的。国民党反动派为了掩盖蒋介石的乱命起见，把不抵抗的失策，又完全归之于张学良。张只好忍辱负重，背着不抵抗将军的骂名，一听蒋介石的摆布。因而奸险狡猾的蒋介石，用苦肉计的手段，使张学良将军下野，出游意大利。张在意大利为时虽不到一年，但受法西斯的感染甚重，欣赏他们讲独裁不讲民主，拥护一人为领袖的作风。故张回国后，高唱拥戴蒋介石为领袖，一切惟蒋之命是听，对蒋以父执视之。其动机不过想以此激发蒋介石，帮助蒋介石把国家搞好，以便收复失地，重整山河。殊不知蒋介石以流氓市侩之资，沐猴而冠，根本没有国家人民的观念。他为了巩固其反动的势力，不惜勾结洋人祸国殃民，以自残杀。所以，蒋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，始终贯彻不抵抗政策，对国内革命则坚决镇压。张学良将军目睹这种情况，已觉事与愿违，内心感到不安。然而张此时对于中国共产党，尚无正确认识，还以旧历史的眼光，看作是“流寇”。故仍追随蒋介石，以解决共产党为前提。一九三五年，蒋介石调东北军在豫、鄂、皖“剿共”之后，又派张学良率东北军入陕甘“剿共”，在西安设一西北“剿匪”总司令部，蒋自任为总司令，任张学良为副司令。蒋之阴谋在于使东北军与共产

党红军互相冲击，结果两败俱伤，或伤某一方面，他都坐收渔人之利。张对于蒋是信服的，意想不到蒋有这样居心，于是毅然接受“剿共”之命。当时有一插曲，即妒贤嫉能器小易盈的陈诚，企图到西北立功，欲亲自挂帅，对于任张为副司令表示反对。而不知蒋的阴谋深刻，别具肺肠。后来西安事变发生，陈诚颇以有先见之明自负。实则当时是嫉妒张学良，争权夺利而已。

二、张学良之于蒋介石

张学良将军承继乃父张作霖封建割据的遗业，掩有东北辽宁、吉林、黑龙江三省地盘，加以热河，察哈尔之辅助力量，基础相当巩固。当时国内其他军阀的实力，无出其右者。一九二八年，因父亲张作霖被日寇炸死于沈阳，急于报父仇，并为保全东北起见，不惜违反乃父誓不与蒋介石合作之意气，仓卒易帜（后来枪杀杨宇霆，主要因杨反对易帜，有勾结日寇之嫌），而对于蒋介石之背叛孙中山先生的遗嘱和革命的三民主义，未加思考。不了解蒋介石之为人，不明白国民党的真相，只从主观愿望出发，遂在一时的形式上，成就了蒋介石以武力镇压国内各军阀，统一了混战的局面。从此蒋介石也就更进一步实行反人民的战争，在英美和日本帝国主义支持下，坚决“剿共”达十年之久。先是张作霖进入北平当大元帅，因早年在东北曾与孙中山先生一度合作过，对蒋介石以后辈视之。迨革命军北伐，蒋介石任北伐军总司令，节节胜利，此时日本军阀，阴谋使张作霖实现袁世凯出卖东北的二十一条，因出兵山东济南，阻止北伐军前进，以表示助张。同时日本即由驻北平